

从“南社”到“新南社”看柳亚子思想的进步性

孟丹青

(南京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从“南社”到“新南社”,充分体现了柳亚子思想的进步性与革新性。南社分化的原因一是内部唐宋诗之争,二是外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南社分化的实质是南社成员内部新旧思想、进步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

关键词:柳亚子;“南社”;“新南社”;进步性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07)03-88-05

柳亚子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近代重要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主要成员和领袖人物。南社是一个以提倡民族气节,鼓吹反清排满革命为宗旨的民间文学团体。陈去病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宁调元说:“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高旭说:“然则社以南名,何也?乐操南音不忘其旧。”^[1]所以以文学反抗清朝专制统治,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革命,是南社的一个主要文学和政治目的。

南社的成立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及发展有密切关系。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得到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1909年11月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召开成立大会时,到会的17人当中就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柳亚子在回顾南社的历史时说:“我们发起的南社,就是想和中国的同盟会做犄角的。因为民族主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产物,赵宋、朱明的末代,更有鲜艳的血史,在文学界上占着重要位置。所以我们的提倡,就侧重在民族主义那一边”^[2]。可见早期南社弘扬的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旋律。南社前后延续了几十年,成员多达千余人,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在宣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南社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酝酿、成立、发展时期,后期是分化、衰落、解体时期。导致1923年柳亚子等另起炉灶,创办“新南社”。由“南社”到“新南社”,这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使之然,也与南社领袖柳亚子等人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关。

南社的分化,表面的原因是南社成员内部的“唐宋诗之争”。在虎丘的南社成立大会上,因为宗唐、宗宋问题,南社成员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清朝末年,同光体盛行,其作品以宋代江西诗派为宗,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郑孝胥等,他们大都是清廷官吏,对民主革命不满。同光体又是宋诗运动的延续和产物,宋诗运动是清道咸间诗坛上学宋诗派的总称。宋诗运动的出现是对明代前后七子以来“诗必盛唐”的极端拟古主义、形式主义风气的反拨,他们标榜学杜甫、韩愈、苏东坡、黄庭坚,尤其推崇黄庭坚的诗歌。主张诗歌不俗,重视诗人的人格修养,强调文品与人品的统一,到后来发展为洁身自好,抱残守缺,不关心国家大事,不随时代进步而进步的保守主义。柳亚子对当时流行于诗坛的学宋潮流深为不满,反其道而行之,尊唐抑宋。他认为盛唐之音昂扬向上,代表开国气象而宋诗则满纸哀音,偏于晦涩消沉。结果在成立大会上,柳亚子和蔡守、庞檠子等因唐宋诗问题发生争论,把不善言辞的柳亚子气得大哭,也为以后南社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柳亚子之所以反对宋诗运动,不仅是美学观念、文学观念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基于政治立场。他1911年在《胡寄尘诗序》中说:“今日诗道之弊,其本原尚不在此。论者亦知倡宋诗以为名高,果作俑于谁氏乎?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

收稿日期:2007-03-14

作者简介:孟丹青(1973-),女,安徽淮南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深，以文浅陋。”他认为宋诗运动的起源是一些罢官废吏附庸风雅而产生的，同光体的代表诗人大多做过清朝官吏，效忠朝廷，到了民国以后，仍以亡国遗老自居，在作品中攻击革命，抒发对封建社会的眷念。具有革命共和思想的柳亚子自然对他们不满。他说：“我和鸳鸯的争辩，发源于宋诗问题，讲起来是很可发笑的。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年，江西诗派盛行，他们都以黄山谷为鼻祖，而推崇为现代宗师的却是陈散原、郑海藏二位先生，高自标榜，称为同光体，大有去天五尺之概。我呢，对于宋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怨，我就是不满意于满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国大夫的遗老们。亡友陈勒生烈士曾经说过，满清的亡国大夫，严格讲起来，没有一个是好的。因为他们倘然有才具，有学问，那么，满清也不至于亡国了。满清既亡，讲旧道德的话，他们应该殉国；不然，便应该洗心革面，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而他们却不然，既不能从黄忠浩、陆钟琪于地下，又偏要以遗老孤忠自命，这就觉得进退失据了。勒生对于他们是深恶痛绝的，而我便很同情于勒生”^[2]。从不满满清到不满亡国士大夫到不满宋诗派与同光体，这成为柳亚子的诗学逻辑。

就像郑逸梅指出的：“细细分析一下，那唐宋诗之争，是封建的旧思想和革命的新思想之争。当时崇尚宋诗的，大都推崇同光体，而同光体的诗人，什九是一班遗老，遗老满头脑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恰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战斗意旨相矛盾。亚子反对遗老，进一步反对同光体，更进一步并整个宋诗都在反对之列。实则反对宋诗，就是反对同光体的诗人，反对同光体的诗人，也就是反对一系列的封建陈腐的残馀渣滓，那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所引起的。”^[3]柳亚子反对同光体，并不是简单的文人相轻、意气用事，他认为：“郑、陈诸家，名为学宋，实则所谓同光派，盖亡国之音也，民国肇兴，正宜博综今古，创为堂皇丽之作，黄钟大吕，朗然有开国气象，何得比附妖孽，自陷于万劫不复耶！其罪当与提倡复辟者同科矣！政治坏于北洋派，诗学坏于西江派。欲中华民国之政治上轨道，非扫尽北洋派不可；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扫尽西江派不可。”“吾侪身为民国之民，何苦为彼亡国士大夫做辩护士耶？”“今既为民国时代矣，自宜有代表民国之诗”“人各有真性情，惟性情不同，各如其面耳。亡国大夫之性情，与共和国民之性情，天然不同。今之鼓吹同光体者，乃欲强共和国民以学亡国士大夫之性情，宁非荒谬绝伦耶！”^[4]可见柳亚子论诗，更多的是从政治立场出发，看其是否符合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需要，他认为同光体是亡国士大夫文学，抒发的是亡国之音，不能体现民国气象与民国精神，自然对之十分鄙夷。

所以唐宋诗之争，不只是不同文学观念之间的论争，而且是拥护封建专制还是拥护民主共和的新旧思想之争，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保守的封建主义思想之争。过于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与政治性而忽视文学独立于政治以外的审美价值，是柳亚子文学观的不足之处，狭隘的政治一元论也导致他的独断专行。但在当时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烈的时代，他的文学观顺应了时代潮流和革命需要，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

柳亚子的文学观深受传统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小人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毛诗序》中也认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为国家服务，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正是出于对文学社会作用的重视，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5]柳亚子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他在领导南社时，以文学为武器积极响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表文章鼓吹革命，使南社成为“同盟会的宣传部”。对大多数南社成员来说，对革命的热情要超过对文学的热爱，其中不乏为革命献身者，如宋教仁、陈其美、宁调元等。武昌起义的胜利，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南社成员奔走相告，欣喜若狂。这时也是南社的鼎盛期，许多社会名流和达官都是南社成员。但是很快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并企图复辟帝制，这时的南社成员又群起而攻之，对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口诛笔伐，发表大量文章揭露袁的倒行逆施与丑恶嘴脸。这些都说明南社虽然是个松散的民间文人组织，却又是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积极入世的革命文学团体。这些和南社领袖高天梅、陈去病、柳亚子等人的文学观念有密切联系，他们把

《南社丛刻》第5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影印本。

文学当作干预现实、改良社会、影响群众的有力武器。

柳亚子少年时便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富有革新精神。他曾经崇拜过梁启超和龚自珍,龚自珍的诗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不满社会黑暗,呼吁改革,在当时起到了震聋发聩、惊顽立懦的作用。柳亚子的诗歌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也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和革命理想,具有“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的壮志。他在长诗《放歌》中对封建专制政体表示不满,同时表达出对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仰慕:“上言专制酷,罗网重重强,人权既蹂躏,《天演》终沦亡。众生尚酣睡,民气苦不扬。豺狼方当道,燕雀犹处堂……私心窃景仰,二圣难颉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阍。《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6]。柳亚子还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熏陶,崇拜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人权”,字“亚卢”,也就是“亚洲的卢梭”。卢梭的“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人们经过协议,订立契约,建立公民社会,人民同时有权力推翻破坏契约,蹂躏人权的专制政体。

从维新改良到民主共和,难能可贵的是柳亚子接受了某一种思想观念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能不断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接受更新的思想。所以当梁启超成为保皇派,鼓吹君主立宪时,柳亚子毅然站在反对派一边,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维新派转变为革命派。他四处筹集经费出版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本书出版后引起社会轰动,有力地打击了保皇派。这些都体现了柳亚子思想中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决定了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光明,寻找救国救民道路,与时俱进的一生。

1917年南社成员之间的唐宋诗之争持续了一个多月,愈演愈烈,上升为对柳亚子的人身攻击和谩骂。盛怒之下,柳亚子以南社主任的名义,宣布驱逐拥护“同光体”最甚的朱鸳雏、成舍我入社。这引起广东分社成员蔡守的不满,他在《中华新报》上发表启事,要求改选南社主任,虽然没有成功,却影响了南社内部的团结。因论诗引起的这场内讧,是南社的致命伤。柳亚子虽然得到大多数社友的支持,但从此心灰意懒,态度消极,1918年推荐文学观念相对保守的姚石子为南社主任。南社的分化说明南社成员之间的精神凝聚力正在减弱,民国的建立,使反满、反清的表面目的已经达到,维系南社成员之间的政治目标不复存在。就像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对南社的评价:“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便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并非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对者。”^[7]鲁迅揭示出了南社成员中一部分保守派的思想,他们推崇儒家传统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最终成为迂腐的封建文化的卫道士。

南社解体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1917年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爆发,大量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潮涌进,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否定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否定旧文学。新的白话文逐渐取代了旧的文言文,现代文学取代了古典文学,这也是文学演进的必然趋势。以旧体诗创作为主流的南社也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胡适在《寄陈独秀》中批评南社说:“尝谓今日,文学已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压韵而已。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以提倡民族气节,拥护排满反清革命相号召的南社,在新文化运动者眼里和同光体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南社的解体成为必然。柳亚子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在《我和朱鸳雏的公案》中说:“追求南社没落的原因,一方面果然由于这一次的内讧,一方面实在是时代已在五四风潮以后,青年的思想早已突飞猛进,而南社还是抱残守缺,弄它的调调儿,抓不到青年的心理。”他总结南社的历史作用时,说:“南社文学,在反清反袁上是不无微劳的。不过它不能领导文学界,致为‘五四’以后的新青年所唾弃,却也是事实。”^[2]

《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但是，作为南社领袖的柳亚子并不是抱残守缺的人，而是不断与时俱进，努力顺应时代潮流。当他看到南社成员分化，不少人思想上趋于保守，政治上走向反动，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南社更显得暗淡无光，以前的革命性几乎消失殆尽，许多成员公开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于是他决定改组南社为新南社，1923年5月和叶楚伦、胡朴安、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等发起组织新南社。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说：“新南社的成立，是旧南社中一部分的旧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的新朋友，联合起来，共同组织的。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2]在这里，柳亚子不仅提到了三民主义、民众文学，还提到了社会主义的实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柳亚子受到十月革命的感召，醉心于马克思学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自称是“李（列）宁私淑弟子”，这也是他以后与国民党右派分裂，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列的原因之一。柳亚子又一次站到了时代的前列。

柳亚子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也是有过程的。他说：“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以至打倒孔家店，在我都是很早的主张。欢迎德先生（民治）和赛姑娘（科学）来主持中国，我当然也举双手赞成……”^[2]但他一开始对旧文学还有所留恋，认为白话文适合写议论文，不适合写诗。“予谓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又诗文本同异流，白话文便于说理论事，殆不可少，第宜简洁，毋伤支离，若白话诗则断断不能通。”^[4]所以“只有打倒旧文学这一点，因为习惯的关系，最初觉得不能接受……”^[1]但是这种迷惘是短暂的，他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说明了自己对新文化运动态度的转变，如何由不理解到支持和响应，“新文化运动发现之初，文言白话的争论，盛极一时。我最初抱着中国文学界传统的观念，对于白话文，也热烈的反对过；中间保持放任主义，想置之不论不议之列；最后觉得做白话文的人，所怀抱的主张，都和我想合，而做文言文去攻击白话文的人，却和我主张太远了，于是我就渐渐地倾向到白话文一方面来。同时，我觉得用文言文发表新思想，很感困难，恍然于新工具的必要，我便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了。”^[2]1923年，他还在家乡创办《新黎里》报，大力宣传新文化运动，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在《新黎里 发刊词》中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日新又新之说也。潮流澎湃，一日千里，吞养吐碳，舍故取新，苟非力自振技，猛勇精进，欲不为时代之落伍者，乌可得哉？”^[4]从中可以看出他思想中求新求变的一面，正因为他有一种实事求是，不懈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才能够不断放弃成见，顺应时代潮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

和柳亚子相反，南社中许多成员却日益走向保守的道路。南社湘籍作家便成立“南社湘集”与“新南社”及新文化运动对抗，在章程中强调“发扬国学，演进文化”，创作“以文言为准”，表现出对旧文化的浓重眷念。李贻在《湘集》上发表《论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是世界先进，“其文艺之优美，思想之发达，亦殊足以自豪也。”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拒绝接受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他们还极力维护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表彰守寡或自杀的贞节烈女，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妇女就应该从一而终，把对妇女的戕害当作美德来欣赏。李德群的《劝学所记》批判严复翻译的《进化论》是“一二妄庸巨子务于功利”而倡导的学说，是乱世之说，而正学则应是“以礼为维系，故道德一，风俗同，足以袭强邻之觊觎而莫能动摇。”他们视新文化运动为洪水猛兽，负隅顽抗，固守旧文化阵地。柳亚子对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我有一句忠告的话，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8]柳亚子和鲁迅一样，是从旧文化的阵营里来的，反戈一击，更能致敌人于死地。

陈寅恪先生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9]。在社会文化转型期，旧的价值被质疑和推翻，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建立，这时的知识分子就会面临新旧选择的痛苦与困惑。对于受过旧文化熏陶，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人们来说，他们往往会选择自己所熟悉的旧文化，表现出固守传统、排斥时代潮流的不合时宜、顽固保守的倾向。比如林琴南、王国维，南社湘集成员也是如此。从一个深受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到放弃自己用惯的文言文与语言习惯、思维习惯而使用白话文和支持新文化革命，这是需要一些革新精神和勇气的。在南社大部分成员还在抱残守缺的时候，柳亚子却和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朋友一起重新组建新南社，以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号召。从“南社”到“新南社”，柳亚子思想中的进步性由此可见一斑。

柳亚子的一生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但他能够始终顺应

时代潮流,选择代表时代进步方向的思想,而不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他曾经拥护过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一旦康、梁思想倒退,成为保皇派,他又毫不犹豫对他们进行批判,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是国民党元老,但一旦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时,他又毅然脱离国民党,和宋庆龄、何香龄等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满怀希望,1945年就写诗歌颂:“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建国后,他和毛泽东诗词唱和,留下脍炙人口的《浣溪沙》。尘埃落定,盖棺论定,柳亚子的一生不愧是追求光明,探索真理的一生,郭沫若评价柳亚子:“是一位典型的诗人,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何香凝也说:“亚子先生自早年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以来,一直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他一生坚贞不屈,爱憎分明,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从来没有屈服过”^[10]。柳亚子先生思想中的这种进步性、革新性显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参考文献

- [1] 郭延礼.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2] 柳亚子. 南社纪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3] 郑逸梅. 南社丛谈[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4] 柳亚子著,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磨剑室文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5] 梁启超. 梁启超文选[M]. 广州: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 [6] 柳亚子著,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磨剑室诗词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7] 鲁迅. 鲁迅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8] 柳亚子,上海图书馆编. 书信辑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9] 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20年[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 [10] 民革中央,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柳亚子纪念文集[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陈东林)

Looking at Liu Yazi's Revolution from South Club to New South Club

Meng Danqing

Abstract: From South Club to New South Club, Liu Yazi's revolution and progress were adequately expressed. One reason for South Club's disunity was the argument of Tang poetry and Song poetry. The other reason was the outside impact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essence of South Club's disunity was the club members' struggle for the old and new, and for the progressive and conservative.

Key words: Liu Yazi ; South Club ; New South Club ; progressiveness

· 名著撷谈 ·

唐僧是一位勇者

在取经四人中,唐僧是唯一的肉胎凡身,没有神通,不懂武艺,几乎没有任何的自我保护能力,即便一个普普通通的蠹贼,都有可能随时置他于死地。而且,与肉瘦毛长的孙悟空和皮糙肉粗的猪八戒、沙和尚不同,唐僧长得白白胖胖、细皮嫩肉,美味不算,再加上吃一块唐僧肉长生不老的超级营养价值,一路之上,不知有多少妖怪盘算着要将唐僧擒来细涮,或油炸、或红烧、或清蒸,做一盘香喷喷、热乎乎的下酒菜。

本身没有自我保护能力,却又成为几乎所有妖怪处心积虑的捕杀对象,可以说,唐僧取经所走的十万八千里路,步步荆棘,处处危难,随时可能成为某个妖怪的腹中之食。但是,面临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唐僧从来没有改过初衷,产生过退缩、畏惧的情绪。即使多次身陷洞窟,面对妖怪的血盆大口时,唐僧也从未瘫软在地、更不曾发声求饶,只是一遍遍地默念佛经、高诵佛号。一个人明知前途危险,却执意前行,面对死亡,又能淡定自若,这样的人非勇者而何!

(举人)